跨文化视域下印尼华人茶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当代转化

秦为芬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福建 福州 350300）

摘 要：印度尼西亚华人茶文化作为中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分支，兼具跨文化融合、族群认同与经济社会价值。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梳理印尼华人茶文化的历史演化脉络，探讨其当代形态特征与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印尼华人茶文化经历了从海上贸易网络到殖民时期种植推广、再到独立后文化政策变迁的历史演化，已形成独特的在地化形态与跨文化融合特征。然而，这一文化遗产仍面临代际传承断层、本土认同与原乡记忆张力、政策支持不足等挑战。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非遗申报与保护体系建设、深化茶文旅融合、构建跨代际传承机制、加强同印尼茶文化交流合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海外华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印尼华人；茶文化；跨文化传承；文化认同；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291(2026)09-0190-04

文化遗产保护与跨文化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海外华人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契机。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Efferin与Pontjoharyo的研究，2000年印尼华人约占总人口的1.40%至1.99%[1]。印尼华人以闽南、潮汕、客家移民为主体，其茶文化体系融合了中华茶艺传统与爪哇、巽他等本土文化元素，构成了独特的跨文化遗产形态。在茶叶产业方面，印尼是世界重要的茶叶生产国。根据Kustanti与Widiyanti的研究，印尼是世界第五大茶叶生产国，其中约65%的产量用于出口[2]。然而，当前印尼华人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系统性研究。

本文立足于跨文化视角，拟构建“遗产保护—文化活化—社区共享”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海外华人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探索可复制路径。

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1.1 国外学术界关于移民文化遗产与茶文化的研究

关于移民文化遗产研究，Anderson（1991）提出“想象的共同体”理论，阐释了移民社区通过文化实践建构集体认同的机制[3]；Appadurai（1996）从全球化视角分析文化流动与“去地域化”现象[4]。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Tan Mely G.（1991）发表于Indonesia期刊的研究被引用97次，是印尼华人社会研究的奠基性文献之一，系统探讨了印尼华人的社会文化角色[5]。Efferin与Pontjoharyo（2006）的研究从族群性（ethnicity）视角分析印尼华人商业文化，指出印尼华人的族群性“不能与国家的角色分离，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国家角色的产物”[1]。

在茶文化研究领域，Pan等（2022）发表于Chinese Medicine的综合性研究指出，茶树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中国先民饮茶的历史已超过3000年，该研究被引用超过320次[6]。Gilbert（2008）在Education About Asia发表的研究系统梳理了茶叶贸易如何推动全球茶文化的形成，指出欧洲殖民者在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茶叶种植园的历史进程[7]。在爪哇茶文化研究领域，Rahmanita等（2024）发表于LINGTERSA期刊的研究比较了爪哇与四川的茶饮传统，明确指出爪哇茶文化中存在中华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的痕迹[8]。

1.2 国内关于海外华人茶文化的研究

国内关于海外华人茶文化的研究可归纳为历史溯源、文化认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历史溯源方面，庄国土（2016）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的关系，为理解华人茶文化的传播路径提供了历史背景[9]。齐慧（2021）研究了安溪茶的跨域行销，揭示了安溪茶农伴随移民在东南亚开设茶行、开拓市场的历史过程[10]。文化认同方面，郑雨来（2024）以马来西亚玻璃口新村茶餐室为例，指出茶餐室不仅是饮食场所，更是承载华人社区价值观念和文化身份的社交平台[11]。张菁蓉（2021）研究了马来西亚客家擂茶的在地传承与创新[12]。产业发展方面，林芳（2020）以新加坡华人茶商为例，分析了海外华人茶商在拓展贸易活动的同时积极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重要作用[13]。何慧娟（2023）探讨了“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路径[14]。

既有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三重局限：其一，重历史溯源轻当代转化，产业化与文旅融合路径未被纳入分析框架；其二，印尼华人茶文化融合多元传统与本土文化的

作者简介：秦为芬（1985-），女，汉族，山东沂水，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海外华人社会、跨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混杂性”特征未得到充分阐释；其三，缺少将“非遗保护”“社区参与”“产业发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系统研究。本文以印尼华人茶文化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视域下探讨其传承保护与当代转化路径，既回应学术空白，亦回应时代关切。

2 印尼华人茶文化的历史演化与当代实践

作为中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分支，印尼华人茶文化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融合特征。本节基于可考证的历史文献，梳理印尼华人茶文化的演化脉络与当代形态。

2.1 历史演化脉络：从海上贸易到在地融合

2.1.1 早期茶叶贸易网络的形成（17世纪—18世纪中叶）。根据德国汉学家罗德里克•帕拉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茶叶贸易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早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人已在马六甲、爪哇北部等地建立小型属地，为后来的茶文化传播奠定了网络基础[15]。

17世纪初，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扩张，茶叶贸易逐渐制度化。据帕拉克整理的历史档案记载：1636年12月，5艘中国帆船将30担茶叶从厦门运抵台湾；1637年1月，2,350斤茶叶经台湾运抵巴达维亚[15]。在1690至1719年间，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商人每年向巴达维亚运送500至600担茶叶。茶叶占其在巴达维亚销售总收入的比例从1690年代的至少20%上升至1714年的37.90%，1719年更高达90%[15]。

2.1.2 巴达维亚华人社区与茶叶贸易的鼎盛（18世纪）。18世纪是巴达维亚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根据帕拉克的研究，1730年茶叶贸易达到峰值10,762担，金额564,294 rijksdaler[15]。然而，1740年巴达维亚发生华荷冲突，许多华人在此事件中丧生，导致中国船只数量急剧下降。至1743年，茶叶供应量骤降至仅76担，标志着巴达维亚作为茶叶贸易中转枢纽地位的终结[15]。

2.1.3 荷兰殖民时期的茶叶种植（19世纪）。根据Rahmanita等的研究，茶树（Camellia Sinensis）于1684年以种子形式首次传入印尼，由德籍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Andreas Cleyer带至巴达维亚，最初仅作观赏植物。1728年，荷兰殖民政府开始从中国大量引进茶种[8]。

1830年，强迫种植制度（Cultuurstelsel）实施，茶叶成为强制种植作物。据Rahmanita等的研究，1841年爪哇茶园面积达2,129hm^2，1846年增至3,193hm^2。1870年强迫种植制度结束后，普里昂安地区（今西爪哇）因茶叶种植繁盛而被称为“绿色黄金”[8]。

这一时期，饮茶习惯逐渐从华人社区扩展至印尼各族群的日常生活。

2.1.4 独立后的文化政策变迁（1945年至今）。印尼独立后，华人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政策变迁。

1998年后，印尼华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Efferin与Pontjoharyo指出：“随着2000年第6号总统令撤销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1967年第14号总统指令，华人群体现在可以自由地庆祝其文化活动。‘WNI Keturunan’（外国血统的印尼公民）一词逐渐被简单的‘印尼公民’取代，华人被承认为印尼众多族群之一。”[1]

这一政策变迁为华人茶文化的公开传承与活化提供了制度空间。

2.2 当代形态特征：多元融合与在地创新

2.2.1 茶饮形态的在地化。在茶叶产业层面，印尼茶业深受荷兰殖民历史影响，以红茶生产为主。据2021年数据，印尼是世界第八大茶叶生产国，主要产区集中在爪哇岛（种植面积占全国65%）和苏门答腊巴里桑山脉地区。印尼红茶以CTC（切碎-撕裂-卷曲）红碎茶为主，汤色明亮，滋味温和，适合制作工业茶包和即饮茶。华人对印尼茶饮文化影响深远：一方面，拉茶（Teh Tarik）这一加入炼乳的红茶饮品深受华人喜爱，成为印尼茶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苏门答腊地区也有专门针对华人市场生产的高山乌龙茶。这种“西式红茶生产+中式茶饮习惯”的融合模式，构成了印尼茶饮文化的独特面貌。与此同时，Rahmanita等的研究还明确指出，爪哇茶文化呈现出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特征：“In Tegal itself,the presentation of tea comes from the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Namely using several small cups accompanied by a teapot.” （直葛的茶饮呈现方式源自中华文化的融合，即使用小茶杯配茶壶的形式。）[8]

值得一提的是，特有的Teh Poci（茶壶茶/陶壶茶）是这一融合的典型代表，起源于中爪哇直葛（Tegal）及周边地区，使用陶壶冲泡茉莉花茶，配冰糖饮用。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用冰糖但不搅拌，让糖自然融化，寓意“人生先苦后甜，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8]。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茶文化和爪哇茶文化融合的坚实证据。

2.2.2 茶文化的社会象征功能。根据Rahmanita等的研究，茶在印尼社会中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Tea is a symbol of togetherness,hospitality,and social unity in Indonesia.”（茶是印尼团结、好客和社会凝聚力的象征。）[8]

在爪哇社会，茶深度嵌入宗教与社会仪式。传统的Slametan仪式中的茶道是重要的宗教和社会活动组成部分[8]。

2.2.3 华人文化认同的“印尼化”趋势。Efferin与Pontjoharyo的研究揭示了印尼华人文化认同的复杂光谱。他们将印尼华人分totok（仍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儒家价值观者）和jiaosen（日常生活中不践行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本土和中国/儒家文化混合体者）[1]。研究发现，大多数年轻一代印尼华人有日益“peranakan化”的趋势。这一发现对理解华人茶文化的传承挑战具有重要启示：茶文化的传承模式可能因totok与jiaosen的不同文化取向而呈现差异，且面临年轻一代文化认同弱化的挑战。

2.3 中印尼茶产业合作的当代发展

2018年12月17日，亚洲茶叶会议在印尼首都雅

加达举行，这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茶产业的首次正式会面。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新闻稿，会议签署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印尼茶叶协会（Asosiasi Teh Indonesia）、印度茶叶协会三方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合作领域包括茶叶贸易互通、技术交流、茶农利益保障等[16]。同年，中国六堡茶首次出口印尼，数量为160箱，标志着两国茶产业贸易互通迈出新步伐[16]。两国茶产业的合作发展为推动印尼境内华人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有利影响。

3 印尼华人茶文化传承与活化面临的挑战

基于文献分析，印尼华人茶文化的传承与活化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3.1 代际传承机制薄弱与文化认同弱化

Efferin与Pontjoharyo的研究指出，印尼过去的文化压制使印尼华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西化；儒家价值观仅通过父母教育传递给年轻一代，且往往仅作为家庭/私人事务中的适当行为来教授。因此，西化进程已将许多核心儒家价值观转化为边缘价值观，甚至在公共领域的日常互动中逐渐消失[1]。

这一分析对理解茶文化传承的代际断层具有重要启示：印尼过去的文化压制政策导致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断裂，年轻一代华裔对传统茶文化的认同感可能相对薄弱。

3.2 本土认同与原乡文化记忆的张力

Efferin与Pontjoharyo的研究发现，印尼华人倾向于将自己认同为“Chinese Indonesian”（华人印尼人）而非“Indonesian Chinese”（印尼华人），在地环境的熟悉度优先于文化/血缘纽带[1]。研究显示，在被问及最希望投资的国家时，即便是文化取向更为传统的totok群体，选择印尼（37%）和中国（38%）的比例也相当接近；而新生华裔（jiaosen）群体中，选择印尼的比例（46%）远高于中国（19%）[1]。这一发现揭示了印尼华人茶文化传承面临的深层困境：年轻一代华裔的文化认同呈现“印尼化”趋势，对“中国传统”的情感联结相对疏离；而茶文化作为“华人性”的重要符号，其传承又依赖于对原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3.3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不足

尽管印尼多元文化政策已转向包容，但针对华人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机制仍显薄弱。Efferin与Pontjoharyo的研究指出，鉴于族群敏感性在印尼社会并未完全消除，多数华商仍持谨慎的“观望”姿态以应对政局波动[1]。令人忧虑的是，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天然承载者，华人群体内部对自身文化遗产的保护自觉与传承行动亦显匮乏。

4 印尼华人茶文化传承与活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 推进非遗申报与保护体系建设

建议印尼华人社团联合推动华人传统茶礼纳入印尼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参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制度设计，推动建立传承人认定、传习补贴等制度安排。建议设立“印尼华人茶文化遗产保护基金”，资金来源可采取“政府专项拨款+华人社团捐赠+企业赞助”多元模式。

4.2 深化茶文旅融合与文化产业发展

建议规划连接雅加达格洛多克华人区、泗水老城区、三宝垄郑和庙、棉兰华人街的茶文化主题廊道，通过深度游串联品茶、观史、体验全链条。

实施茶文化IP工程，挖掘“下南洋”“侨乡茶韵”等文化符号，开发融合华人传统茶具设计与印尼本土工艺（如巴迪克纹样）的文创产品。

4.3 构建跨代际传承机制与人才培育体系

建议构建“学校教育—社区传习—职业培训”三位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华人茶文化纳入印尼华文学校课程体系；依托茶馆等空间载体定期举办青年茶艺工作坊；设立茶艺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设立“青年茶艺人才奖学金”，资助优秀青年华裔赴中国茶文化核心区研修学习，建立“师带徒”传承机制。

4.4 加强中印尼茶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

建议依托“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推动中印尼两国文化部门深化茶文化交流合作。在中国福建、广东等侨乡设立“印尼华人茶艺研修基地”；在雅加达、泗水等地设立“中国茶文化体验中心”。以2018年亚洲茶叶会议为基础，推动中印尼两国茶叶行业组织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促进茶叶贸易与茶文化传播的协同发展。

4.5 促进跨族群交流与社会融合

建议将华人茶文化定位为“印尼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表达中强调其“在地性”与“融合性”特征。Rahmanita等的研究已表明，Teh Poci等融合性茶饮体现了中华文化与爪哇本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8]，这种融合性特征应成为华人茶文化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

鼓励华人茶文化活动向印尼全社会开放，邀请不同族群共同参与，通过茶文化讲述“印尼华人故事”。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剖析了印尼华人茶文化跨越四世纪的“在地化”演进，揭示了从17世纪贸易巅峰到当代“混杂性”形态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印尼华人茶文化历经贸易繁荣、殖民种植及独立后政策波动的多重塑造，形成了独特的在地化特征，以Teh Poci为代表的融合实践展现了移民文化遗产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强大韧性。

为应对挑战，本文提出涵盖制度、实践、人才、国际、社会的“五位一体”政策路径，推动非遗申报与茶文旅深度融合。

展望未来，印尼华人茶文化正迎来多元文化政策深化、“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及全球健康消费浪潮的三重机遇。通过构建“遗产保护—文化活化—社区共享”的联动机制，华人茶文化不仅能实现族群内部的记忆修复，更将升华为连接中印尼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区域社会融合的重要文化桥梁。

广西六堡茶非遗与茶艺培训体系的协同创新

张婉婷[1]，詹潇洒[2]

（1.广州知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广州市海珠区茶缘道茶行，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广西六堡茶制作技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如何通过与“三茶统筹”理念，在茶艺培训体系中深度融合来实现创新；分析了广西传统六堡茶的非遗核心价值和传承挑战；梳理了目前以“茶旅融合”、数字化技术应用和产教融合为代表的创新培训总结。研究发现，构建“非遗传承、技能培训、产业赋能”的创新协同模式，能够有效解决非遗传承人的断层、茶文化内涵剥离、还有与市场脱节等问题，为广西六堡茶的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旨在为非遗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六堡茶；非物质文化遗产；茶艺培训；三茶统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291(2026)09-0193-03

1 引言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于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广西六堡茶制作技艺以其独特的“槟榔香”、“红、浓、陈、醇”四绝、“茶船古道”商贸文化和后发酵工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在现代化与工业化浪潮下，包括广西六堡茶在内的传统手工技艺普遍面临着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制茶技艺标准化困难、茶文化语境变迁及茶叶市场竞争力不足等多重挑战。

茶艺师是茶文化的重要推广者，其培训体系已经从单纯的茶艺冲泡分享，向覆盖茶文化解读、茶产业服务、茶科技创新等复合型人才培养转变。传统的茶艺培训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非遗传承与茶产业发展的双重需求。探索非遗传承保护与茶艺培训的融合路径，成为了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本文重点在剖析广西六堡茶非遗特质，总结当前茶艺培训的创新方向，希望为构建兼具文化深度与时代适应性的非遗传承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作者简介：张婉婷（1987-），女，广东潮州，高级工程师，高级茶艺技师，高级评茶技师，高级制茶技师，潮州工夫茶艺非遗传承人，研究方向：茶艺。

参考文献：

[1]Efferin,S.,& Pontjoharyo,W.Chinese Indonesian busi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thnicity,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hina.In L. Suryadinata (Ed.),Southeast Asia′s Chinese business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Copi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pp.102-161).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2006.

[2]Kustanti,V.R.,& Widiyanti,T.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in the tea sector in Indonesia.The Business Watch Indonesia,2007.

[3]Anderson,B.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Verso,1991.

[4]Appadurai,A.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5]Tan,M.G.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role of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n society.Indonesia, 1991(51):113-125.

[6]Pan S Y,Nie Q,Tai H C,et al.Tea and tea drinking: China′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mankind[J]. Chinese Medicine,2022(1):27.

[7]Gilbert,M.Chinese tea in world history. Education About Asia,2008(2):11-16.

[8]Rahmanita,R.,Basamah,S.A.,&Rudiansyah. Cultural comparisons: A comparison of tea drinking traditions in Java and Sichuan.LINGTERSA (Linguistik, Terjemahan,Sastra),2024.

[9]庄国土.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J].人民论坛,2016(8):234-236.

[10]齐慧.安溪茶跨域研究[D].华侨大学,2021.

[11]郑雨来.马来西亚华人茶餐室文化研究——以玻璃口新村华人茶餐室为例[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4):19-24.

[12]张菁蓉.马来西亚华人饮食文化研究[D].华侨大学,2021.

[13]林芳.东南亚华人茶商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以新加坡华人茶商为中心的研究[J].福建茶叶,2020(12):326-327.

[14]何慧娟.“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路径研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57-61.

[15]Ptak R.China and the trade in tea and tea-related ceramics in pre-modern Asian maritime trade[M]. PTAK R.China,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Aldershot: Ashgate,2004.

[16]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亚洲茶叶会议在印尼雅加达举行[N].2018年12月20日.